



柯克斌
2012.12.16

改革是實現社會公平
公子的最後途徑

邱毅

2012
齐鲁晚报年度奉献
前方

策划语

民心思改革,但未来十年,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将面临哪些难题,又该如何突破?

本报记者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希冀找到答案。

改革， 从哪砍下第一刀？

文/本报记者 吉祥

首选分配体制改革,所有人都关心

齐鲁晚报:您认为新一轮改革会在哪一领域率先启动?

杨光斌：在改革领域选择上存在一个上下互动，即大多数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决策者最容易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百姓期待的又是决策者能够解决的，必然会是决策者的优先选项。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所做的万人调查,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得到显著改善的

领域中,排在首位的是医疗(68.8%),其次是教育(62.8%),第三是食品安全(60.3%),第四是收入分配(56.7%),第五是住房(53.5%)。

所有这些诉求,其实都是民生政治范畴。新的领导集体无疑会把民生政治当作优先的政策连续性地、加大力度执行下去,因为现在国家不缺钱。

邓聿文:我认为,正确的改革思路应该是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之后再行政治改革,而这一系列改革的连接点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说白了,就是政府如何处理与市场、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

不过,改革应该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切入,首选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因为这基本是所有人都关心的。

最大难题是利益集团化、制度化

齐鲁晚报：改革最难跨越的难题是什么？

杨光斌:在当下中国,人们能普遍感受到社会的不满,而不满的原因来自于社会不公正,社会不公正又根源于官商结合下的权力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的制度化。基于市场和权力利益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

邓聿文: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这些年改革停滞不前,是因为受阻于既得利益。中国改革的实施路径是先增量后存量,增量改革的一大前提是不挑战现有利益,并未对权力的分配有本质改变,相反,权力找到了另外一种自我实现方式。增量改革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改革再出发的难点关键是政府改革。包括垄断也好,反腐败也好,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的问题,因为政府有权力,有审批权,市场监管权,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最重要的又是“一把手”,谁来监督“一把手”,这是关键。如何打破“一把手”对权力的垄断,是下一步改革特别是政府改革要做的事情。

比起改革开放初期,今天的利益集团并不强大

齐鲁晚报：改革是否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才能进行下去？

杨光斌：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再调整。现在有人说邓小平改革时没有利益集团，怎么可能？当时计划经济的各个部门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当时朱镕基搞分税制改革，广东就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坚决反对，后来朱镕基带了61人的代表团，几进几出，最后也谈成了。

今天的利益集团和过去相比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关键是改革者要拿出勇气和魄力。任何改革都要触动利益集团,今天的利益集团并不强大。

邓聿文：现在为何强调改革以增量为主？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區就是对利益存量进行分配的问题，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方面，改革需要继续打破这种阻力；另一方面，如果强行打破的话，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对政治家来说，要考虑一个切实可行的办

法,就是要做大增量。民众还可以从增量改革中获得红利,比如城镇化。

刚才提到在做大增量的同时,还必须围绕利益存量做文章。尽管刚才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很强大,但必须得触动它,到增量改革空间已经释放完毕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触动既得利益。与其那个时候触动,不如现在逐步推进,这样的话,改革的红利可以释放得更充分。

是梦想的空间

政府做不该做的事情越多，
越容易腐败

齐鲁晚报：这个改革最大难题的突破点在哪里？

杨光斌：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总病根”是邓小平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那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总病根”则是市场化积聚的庞大资源又被国家所垄断，即政府资源垄断，否则很难想象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热衷考公务员。

再分权势在必行,实行大部门制并转变政府的计划性和部门主义的职能,改革因权力垄断而形成的资源和市场垄断,在此基础上培育多元化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

邓聿文:无论什么改革最后都涉及政府自身,也就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合理配置政府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现在这两个权时常合在一起;还有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要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政府职能转换,意味着政府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将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将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政府不该做的事情越多,客观上越容易造成腐败。其次,政府的决策要公开,尤其是重大项目的决策必须公开,让老百姓参与进来。